

近世视域下的

宋代社会变革研究

杨永亮 著

JINSHI SHIYUXIA DE
SONGDAI SHEHUI BIANGE YANJIU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出版资助成果

近世视域下的 宋代社会变革研究

杨永亮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世视域下的宋代社会变革研究 / 杨永亮著.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206-14322-9

I. ①近… II. ①杨… III. ①社会变革-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K2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0084号

近世视域下的宋代社会变革研究

著 者:杨永亮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咨询电话:0431-85378033

印 刷:长春市中海彩印厂

开 本:880mm×1230mm 1 / 32

印 张:10.5 字 数:27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4322-9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20 世纪初年，日本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提出了著名的“宋代近世说”，揭橥了唐、宋社会分处于中世和近世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主要是由于唐、宋社会在文化形态上发生了如下的变化：（一）从政治上来说是贵族政治废弛，君主独裁政治兴起；（二）君主地位由贵族阶级的共有物转变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三）君主绝对权力的确立；（四）人民地位的变化，贵族时代，人民被视同为贵族整体的奴隶，到了近世则是君主与人民直接相对；（五）官吏选举法的变化，贵族时代是以九品中正的方式选举，近世时代则是科举制；（六）朋党性质的变化，唐代的朋党纯粹是以贵族为中心的权力斗争，宋代的朋党则明显地表现出政治倾向上的不同；（七）经济上的变化，唐代是以实物作为财富标志的时代，宋代则是货币经济的时代；（八）文化性质上，无论是经学、文学还是艺术上的绘画、音乐，都体现了从贵族性到平民性的转变，总而言之，“中国中世、近世的一大转换时期，就在唐宋间”^①，也即中国从宋代即开始迈入了近世时代。

那么什么是“近世”呢？内藤指出所谓的“近世”主要有以

^①（日）内藤湖南著，林晓光译：《东洋文化史研究·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111 页。

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近世”时代是“平民发展的时代”，在物质上国家认可人民的财产权，人民拥有较为清晰的私有权，这是物质上的变化；在精神方面，学问上自由研究精神大盛；艺术方面出现了文人画，它的真意在于（绘画）脱离艺术家的专门领域。……就算是外行人，只要喜好艺术也就可以来画画”^①；工艺方面开始了以平民为对象的大量生产，尤以织物、陶器为显著，也即工艺的平民化。其次，政治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内藤说政治的核心在于统治，而对“统治”有所理解的绝不仅仅只有人类，诸如蜂蚁、犬牛之流也都拥有统治权，就此而论，政治对于人类生活实在是最原始、最低等的存在。对贵族而言，在政治之外，他们还有学问、艺术、工艺等多姿多彩的生活要素，但这对于身处被统治地位的平民而言则是遥不可及的事情。然而，随着平民时代的到来，平民生活的要素渐渐变得丰富起来，“道德已经不是为了让平民服从他人，而是为了平民自己的生活必要而存在了，平民有了知识，平民也有了自己的趣味”^②，平民开始追求贵族曾经拥有的精神生活，它投射到政治上就是近世官吏生活的变化。内藤说古代的官吏全身心地致力于合理地管理人民的工作当中，而近世的官吏不在以做官为终生的目标，“中国人并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当官不过是为了保证生活而已，在吏事之暇著书立说，流传于世，才是官吏的目的”，因此，“连官吏自己也都已经不把政治看作是重要的东西……

① （日）内藤湖南著，林晓光译：《东洋文化史研究·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8页。

② （日）内藤湖南著，林晓光译：《东洋文化史研究·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0页。

仅此也就可以明白政治的重要性在近代（世）的衰减了”^①。综上所述可知，内藤所谓的“近世”并非是历史时间段上远近的划分，他所看重的是历史的时代内涵，正如他自己在《中国近世史》一书中所讲的：“史学上所讲的近世，并不只是以年代来划分的，必须看它是否具备近世的内涵”^②，具体来说“近世”的内涵就是“平民时代”的到来。

熟悉内藤学术的人大致都能了解，内藤史学长于综括，他能于历史的纷乱中把握其潜移默运的“大势”，“宋代近世说”正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凝练，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历史未来的前行方向。在辛亥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轰然坍塌，正所谓“满清失鹿，群雄逐之”，连番登场的各种政治力量无不围绕“专制”与“共和”二途展开较量，前者以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为代表，后者以孙文的革命党为代表，到底是“专制”还是“共和”，时人也都如雾里看花一般，即如梁任公所言：“夫共和之建，曾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反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莫盖过于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③ 不仅中国人自己对国家前途感到迷茫，就是西方列强也感茫然，因而他们对于清政府和革命党采取了“不干涉”原则，以观时局变动，如德国外交部秘书致德国驻日代办之电文：“帝国政府自中国变化开始以来，即坚持不干

① （日）内藤湖南著，林晓光译：《东洋文化史研究·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

② （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史通论》（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23页。

③ 梁启超著，郑大华、王毅编注：《梁启超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涉原则，所有报纸传闻，谓德国私人帮助清室军队，为帝国政府所前知云云，实属不确。关于此事，或者至今未觅证据或者详查之后知其不确。无论在职或退職德国军官，均未有在清室服务者”^①；唯独只有日本是想极力维持清政府的统治，日本希望通过此次对清政府的援助，消弭两国间因甲午战争引起的误解，“从此互相信赖，共同维持东亚的大局”^②，另一方面，日本企图在列强并争的状态下进一步瓜分中国^③。日本政府如此的对华政策，内藤表示出了坚决地反对，他认为清王朝已濒临灭亡，中国的大势已趋明显，逆势而为对日本并不是最有利的^④。尽管内藤是从维护日本在华根本利益的角度来讲的，但他对于清朝必将衰亡的历史大势的认知是合乎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而且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之类的说教上，他历史观察的起点就在“宋代近世说”上。

① 王光祈译：《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1929年），第4页。

②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4页。

③ 如1911年10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在有影响的军界领袖中间传阅一份题为《关于我们对华政策的我见（绝密）》的意见书，他提出了瓜分中国的八条纲领：（一）照平素主张，先标榜保全中国；（二）到一定程度，援助清朝，防止其颠覆；（三）同时在绝密情况（采取借用反对党之手段等间接手段）助长叛乱分子，而于适当时机居中调停，使以满汉两族分立为南北两国；（四）作为报酬，使有利于解决满洲问题；（五）与上述两国缔结特殊关系；（六）列强分割，首先极力加以反对；（七）到大势所趋，万不得已时，我当然也取得应取部分，但始终须装出并非本意的样子；（八）在我分得的地方，北拥立满人小朝廷，南拥立汉人小朝廷，并以此为诱饵，将其他列强分割地区的全部人心收揽于我，以此准备第二幕的演出。（参见王晓秋：《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

④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支那時局の發展》，東京：筑摩書房1972年，第448页。

就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两个星期的11月24日、12月1日、12月8日，内藤在京都帝国大学星期五的特别演讲做了题为《清朝的过去及现在》的演讲，后以《清朝衰亡论》为题出版。在是论中，内藤从兵力、财政经济和思想变迁三个方面论述了清朝自嘉庆以来国力渐衰的过程，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内藤相信它在革命者的这一边，他说：“今日官军的胜利或者革命军的失败，这都不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大局。无论怎么说，革命主义与革命思想的成功是无疑的。这是中国几百年来的趋势所在，今天完全改变的时机终于来到了。”^①而事实上，随着各省的纷纷独立，清王朝亦如内藤所预想的那样土崩瓦解了。

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用尽政治权谋与手段，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但在内藤看来，袁世凯在政治上就是一个投机的政客，他既没有对共和政治坚定的政治信念，也没有脱离传统政治的窠臼，于是在袁世凯紧锣密鼓地推行“洪宪帝制”的1914年^②，内藤发表了《支那论》一文，开门见山地提到：“将来的中国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是最重大的问题”，而且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有通达历史的精神，又要能够超越历史的痕迹”^③，这是什么意思呢？内藤说：“看清一个国家国情的惯性，它的国土人民的

①（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清朝衰亡論》，東京：筑摩書房1972年，第237页。

② 1914年5月袁世凯召开会议，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又称“袁记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大权独揽，随即又废掉了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并设参议院代行立法权；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替袁世凯鼓吹君主制；杨度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于8月14日发起了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活动；12月23日冬至，袁世凯更于天坛上演“祭天”闹剧。

③（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支那論》，東京：筑摩書房1972年，第308页。

自然发动力正倾向于何处并往何处发展，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发展的方针而不是考虑其他别的方法。这种惯性的、自然发动力的潜移默运的力量，当前正处于耀眼夺目的急转变化之际，在这表面激烈顺逆混杂的流水底下，必定有一个或缓、或重、或钝、或强的力量推动着水流朝向某一固定方向前行。能洞察此种潜流，此即是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① 基于此，内藤认为尽管袁世凯手握重权，表面上似乎可以恣意为为，但这毕竟只是“激烈的顺逆混杂流水”的历史表象，它改变不了中国历史前行的“潜流”——即中国走向共和制的历史大势。那么，这个历史的“潜流”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这还得从中国“近世”说起。内藤说：“历史学家划分时代，常常是确立上古、中古和近世名称，而且只是简单根据时代距离现在较远的为上古，其次是中古，最近的是近世。作为简单意义上时代划分法，又有各个不同的内容。”^② 内藤举例，如西洋的近世，它就意味着文艺复兴之后，西洋社会一般民众势力的增加、新土地的发现、经济上的异常、社会组织的变形等；日本的近世则体现的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渐渐发生变化的时代，即武家的勃兴，也即是平民势力增加的时代；对于中国的近世，内藤持有与日本相同的看法，即平民势力兴起的时代，具体说来就是“从唐代中叶开始，经过五代，及至北宋……这个便是中国近世逐渐显现并日渐稳固的时

①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支那論・緒言》，東京：筑摩書房 1972 年，第 306 页。

②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支那論》，東京：筑摩書房 1972 年，第 308 页。

代”^①，也就是所谓的“宋代近世说”。

当然，“宋代近世说”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说明“宋代是近世的开端”，因为历史始终是在前行的，“近世”的历史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历史运动的惯性，就是内藤所谓的历史的“潜流”，它才是中国历史前行的方向。那么，“近世”历史“潜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还得从“近世”时代的内容上来分析。内藤指出，“近世时代”亦即是“平民时代”，如何来认识呢？首先，平民国家地位的确立。在贵族政治的时代，“君主之地位，大而言之，为贵族阶级之私有物；小而言之，则为其中某一家族之私有物”，“在唐朝之前，如果某一天子的系统统治了国家，那么一国的人民就成为天子家族以及名门望族的奴隶”^②。中唐“两税法”的推行使人民在居住制度上获得了自由解放，摆脱了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到了宋朝，王安石推行新法不仅确认了人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且还承认人民有自由处置土地收获物的权力，这样，人民就不再附属于贵族集团，而成为国家的庶民；其次，平民政治权利的提升。贵族时代的政治就是“政治权利由贵族集团所垄断”，平民什么权力也没有，同样君主对于贵族而言也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权力，因此，在贵族时代崩溃之后，君主自身成了绝对权力的主体，不再与他人分享这一特权；与此同时，随着贵族集团的逐渐丧失，平民从贵族集团的奴仆转向了直接面对君主的臣民，在官吏地位的分配上有着均等的机会，而且平民的财产权也得到国家的

①（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支那論》，東京：筑摩書房 1972 年，第 308～309 页。

②（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支那論》，東京：筑摩書房 1972 年，第 313、324 页。

认可，这样在相对权力的获取上，面对整个贵族集团，君主和平民就站在了同一起点上。但在社会结构上，他们则分属对立的阶级阵营。即便如此，随着近世社会的到来，横亘在君主与平民之间的贵族消失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加快了，在皇权的支配下，平民阶层有了更多上升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皇权对平民财产权的部分认可，是保障平民阶层兴起的重要前提，如此一来，社会阶层不再区分“良”“贱”，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是平民时代的“近世”，又是君主独裁政治的“近世”，这两者是如何共处于“近世时代”的呢？内藤指出：“贵族消失的结果是君主拥有了超越于万民之上的地位”，“随着君主地位的变化，结果臣下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今的天下终于彻头彻尾地成了君主的私有物。所谓天下，化为了君主的私有财产。因而，自古以来天下乃天子与名门望族所共有的形态至此也就消失了”^①，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私有物——天下，它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采取了有意识地重复设置官僚和推行官员回避制，前者的目的在于分权，是官僚之间相互制约，但“这种制约官僚权限的做法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君主独裁政治下的中国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官僚。他们都是直属于天子的仆从，没有自由裁量权”^②。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是“平民的近世”，政治的重要性在下降，官员们也都不以做官为唯一的目的，所以官员群体对于权力的有无与大小并不十分看重，这也就是内藤所指出的君主独裁政治的

①（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支那論》，東京：筑摩書房 1972 年，第 316 页。

②（美）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莺译：《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第 202 页。

特征之一——官僚的无责任心；后者的目的在于防弊，近世以来君主独裁政治，为了获得中央集权也即是无限的君主权力，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采取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方式，官员基本上不能在本籍出仕，这就是近世政治中的另一问题出现了，这就是胥吏。内藤指出，由于官员的任职地基本上都不在自己的出生地，官员由于缺乏任职地的相关情咨，加之对语言、风俗等的陌生，这使得他往往难以很快适任政务的需要，所以他必须借由熟悉地方的胥吏来帮助完成政务工作，这样胥吏成为实质上握有行政权力的群体，对此，内藤指出：“从大势上来看，胥吏诚然握有权力，但也可以说与人民相接触者拥有权力，胥吏夹在人民与官吏之间，中饱私囊，不用说，这确实是弊政。说穿了，就是与人民相接近者，势力增加，而作为上级者，实际上却渐失其势。……现在正处于如排除与人民相接近的一个阶级，势力马上便回归人民的关键时刻。……纵观唐以来的变迁，在刚开始的时代人民的自由或是个人的权利是绝不会受承认的，后来才慢慢变化发展至能予以承认的时代，其结果很可能是出现人民成为政治要素（中心）的倾向。……世界大势的变迁，即便有时出现复古的形式，但实质上都是朝向新的势力中心、新局面发展运动的。君主独裁政治的流弊臻至极处，并不是重新回到贵族政治，而是向另一种政治转化，这便是大势的自然。”^① 因此，在洞晓了中国“近世”以来社会发展的大势之后，再来看待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就能深刻理解只有“身处最高层”，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

总之，内藤的“宋代近世说”既是历史的论断，又是现实政治

^① （日）山田伸吾：《内藤湖南与辛亥革命——另一个“近代”》，日本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41～142页。

近世视域下的宋代社会变革研究

发展预测的依据，张广达先生说：“内藤湖南生当日本盛世，展示了豪迈用世的气概”^①，内藤不拘于对历史进程的排序，他所着意的地方在于历史发展的大势，诸如潜移默运、潜流等，就是要在历史中看待现实，在现实中去发现历史，因此，我们也难以判断“宋代近世说”到底是现实催生的历史呢还是在历史中去认知现实，但内藤在这其中不断强调“平民”的时代个性，倒是给了笔者观测宋代社会的新视角，这也是本书研究的基点。

^① 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目 录

第一章 中世的贵族社会形态	1
第一节 魏晋以来的士族时代	1
一、九品中正制	2
二、门第与世族	5
三、贵族政治	8
四、寒人地位的提升	17
第二节 科举制时代	24
一、科举制的出现	24
二、国家以才选士	27
三、科考的内容	30
四、科举的制式	33
第二章 贵族社会的崩坏	38
第一节 “关中本位”政策的变动	38
一、府兵之制	38
二、关陇集团	42
三、关中本位	44
四、关中衰落	53
五、府兵制的崩坏	57
第二节 文臣与武将	65

近世视域下的宋代社会变革研究

一、牛、李党争	65
二、进士科之弊	66
三、儒学的政治使命	69
四、文人政治集团	74
五、藩镇势力	81
第三章 宋代社会政治的变革	88
第一节 庆历新政	88
一、新政举措	88
二、祖宗之法	91
三、三冗问题	105
四、新政的实质	113
五、宋代“右文”国策	116
六、文官政治	118
第二节 王安石变法	124
一、王安石的早年经历	125
二、王安石幕职韩琦考辨	128
三、神宗君臣	141
四、王安石变法	151
五、新旧党争	174
第四章 宋代社会经济的变革	199
第一节 宋代经济思想	199
一、义利之辨	200
二、农商并重	206
第二节 宋代的社会生活	213
一、宋代的城市文化生活	214

二、宋代的平民阶层	221
第五章 宋代社会文化的变革	233
第一节 从注疏之学到义理之学	234
一、中唐以降的“新春秋学”	234
二、宋初之学	248
三、宋学之义理	268
第二节 宋代文化艺术的旨趣	281
一、市民文化的兴起	282
二、艺术的世俗化	289
参考文献	304
后记	314

第一章 中世的贵族社会形态

历史，意味着承接和开启，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往往采用追溯与展望的方式来思考，如晚清康有为发挥公羊“张三世”，认为人类经过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并以之作为“维新变法”的政治依据。内藤湖南在考察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也将中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古、中古和近世，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各自的时代风貌，也只有体认了各个阶段历史的内涵，才能把握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向，这是内藤史学的基本方法，因此对于中国近世的考查，就有必要先从魏晋以来的中古时代着笔。

第一节 魏晋以来的士族时代

内藤湖南在《中国上古史》的“绪言”中认为“依照文化的时代特色而划分时代……东洋史（即中国史）即可大体划分为四个大的时代。”^①

第一期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上古时代

第一期还可以再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中华文化形成的

^①（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史通论（上）·中国上古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页。